

托尼·莫里森小说《慈悲》中的“人物叙述”

柳 晓

内容提要: 在托尼·莫里森的新作《慈悲》中,种族主义始终造成一种复杂的周而复始的创伤,它将群体、个人的经历、行动和责任交织在一起,使得个体与群体创伤之间不断循环的交互作用,甚至延续数个世纪并影响数代人,从而形成永久的创伤性循环,即一种文化创伤。本文将人物叙述模式的运用与文化创伤的呈现相关联,揭示该作品中莫里森是如何通过人物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交替使用、不同人物叙述的首尾并置,以及不完整的叙述交流,将种族主义呈现为一种难以治愈的文化创伤。

关键词: 慈悲 文化创伤 种族主义 人物叙述

作者简介: 柳晓,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外语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叙事理论和美国文学。

Title: On Character Narration in *A Mercy*

Abstract: In Toni Morrison's latest work, *A Mercy*, racism is presented as cultural trauma. And thus the circulation of trauma as well as the impossibility of its healing is presented through the masterly control of character narration, namely, the alternative use of character narration and third person narration, the juxtaposition of different character narrations as well as incompleteness of narration.

Key words: *A Mercy* cultural trauma racism character narration

Author: Liu Xia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4,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ncludes narrative critic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iuxiao3333@126.com

一、种族主义与文化创伤

文化创伤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与关注个体心灵创伤的研究密切关联的。随着创伤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等人关注个体创伤经历的研究模式受到了挑战^①。比如,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认为,创伤并不一定需要单个的创伤化事件而产生,它也可以通过各种创伤化的经历累积而成。他关于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的界定,从很大程度上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大屠杀、战争、奴隶制等暴力事件对不同群体造成的影响^②。在此基础上,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等几位学者提出了文化创伤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感到他们所遭遇的可怕事件给他们集体意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们的记忆中烙下了永恒的标记,并且还根本地、不可逆转地

改变了他们身份的时候,那么,这就产生了文化创伤”(Alexander et al 4)^④。在尼尔·斯迈尔赛(Neil Smelser)看来,文化创伤指“一种通过相关群体成员的公开讲述而使人接受的回忆,它唤起某种事件或者某类情形,并具有如下特征:有负面效应、无法消除、被认为是对社会存在的威胁,或者是对一种或多种基本文化预想的违背”(Alexander et al 3)。

上述观点表明:个体创伤与群体创伤是相互交织的,因为这种关于群体的回忆实际上也就界定了作为其个体的成员。作为一种个人与群体创伤相互交织的网,文化创伤包含了诸如文化错位/移位、贫穷和种族歧视等各种累积性的创伤,而这种创伤的累积又很可能形成一种复杂的创伤性循环,使得创伤的恢复受到阻碍,甚至造成更进一步的永久创伤。那么,文化创伤究竟是如何与种族主义相关联,这一切又是如何体现在莫里森的创

作之中的呢?

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曾提到,“你可以把种族主义称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经济,但事实上,它是一种病症。……它分裂欧洲,将其变为异类,使欧洲人成为奴隶主,使他们变得疯狂……”(Gilroy 178)。她认为,种族主义不仅仅是奴隶制形成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的邪恶力量,也是一种教育的问题,它已经被教化、被制度化了(Taylor - Guthrie 298)。也正由于她意识到种族主义之复杂性,莫里森在其整个创作中“从未停止过对非裔美国历史上这一伤口的暴露”(Durrant 83)。她总是致力于表现那些痛苦的历史事件以及遭受痛苦的人的各种经历。比如美国土著居民惨遭的近似灭绝的杀戮、因奴隶制的盛行所致的种族主义暴行给人们造成的极为复杂的创伤,这都成为其作品之重要部分。为了让非洲裔美国人在奴隶制前后所遭受的这些创伤能够引起政治上的关注,她在其创作中致力于表现那些悲惨的历史事件,以及遭遇那些事件的人的不断的抗争和痛苦,乃至他们的生存问题。她的新作《慈悲》也是这方面更进一步的探讨。在该作品中,我们发现种族主义始终造成一种复杂的周而复始的创伤,它将群体、个人的经历、行动和责任交织在一起,使得个体与群体创伤之间不断循环的交互作用,甚至延续数个世纪并影响数代人,从而形成永久的创伤性循环,即一种文化创伤。在本文的下面部分中,我们将首先分析这种创伤是如何通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弗洛伦斯的叙事体现出来。

二、弗洛伦斯的叙事中个体创伤之累积和创伤化循环

《慈悲》的叙事模式主要分为人物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两种。小说的部分叙述是佛罗伦斯作为人物叙述者^④的讲述。她以向铁匠诉说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离开母亲后在主人农场生活直至踏上寻找铁匠之路的整个经历。小说的最后一章是弗洛伦斯的母亲作为人物叙述者的讲述。穿插在弗洛伦斯叙述中的则是小说中其他人物^⑤的第三人称叙述。它们在展示这些人物各自经历的同时,与弗洛伦斯和母亲的叙述相互补充、相互联系。

在弗洛伦斯的整个讲述中,我们发现她的经历实际上是多种创伤的累积。首先,奴隶制致使

弗洛伦斯被迫与母亲分离。当弗洛伦斯原来的主人领着雅克·布瓦克让他挑选黑奴作为抵债品的时候,布瓦克看中的是弗洛伦斯的母亲。但是,这位母亲祈求布瓦克带走自己的女儿。在年幼的弗洛伦斯看来,母亲让自己而不是“那个小男孩”(弗洛伦斯的弟弟)离开她,这说明母亲肯定是不爱她,也由此给弗洛伦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与母亲分离使弗洛伦斯极度渴望得到爱,这也使她后来对铁匠的依恋到了极度痴迷的程度。

在寻找铁匠的途中,弗洛伦斯遭遇了一群视她为异类的清教徒的非人待遇。即便在她逃离了清教徒之后,仍然感觉到他们“那些企图从她身上找到一条尾巴,一个额外的乳头的眼睛…那些盯着我看的迷茫的眼神,它们在想着我的肚脐是否长对地方了,或者说我的膝盖是否会像猪的前腿一样向后弯曲”(114)。她觉得自己与动物似乎没有区别。于是,她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自信心也逐渐被削弱。此时,感觉遭母亲遗弃的创伤又返回来折磨她“我母亲知道这一切吗?为什么她不要我了呢?”^⑥(115)她开始认同清教徒的种族主义观点,认为自己黑色的皮肤是邪恶的,母亲之所以抛弃她,也是因为如此。于是,种族主义观点被她接受并且内化为一种自我仇恨、自暴自弃的情绪,这也由此削弱了因与铁匠的爱情而树立起来的自信,从而最终导致了另一次创伤:与铁匠关系的破裂。

在费劲千辛万苦找到铁匠后,弗洛伦斯发现铁匠有一个养子而且十分疼爱他,便不由产生了嫉妒之心。她将自己与铁匠和那孩子的关系等同于自己与母亲和小弟弟的关系,担心铁匠会选择那个小男孩,如同母亲当年选择小弟弟留在身边一样。当铁匠前往弗洛伦斯的女主人家后,弗洛伦斯留下来照看孩子,没想到与他发生争执后误伤了他的胳膊。这一幕正好被归来的铁匠看见,以为弗洛伦斯故意伤害那孩子。他不听弗洛伦斯的解释,执意赶走她。弗洛伦斯愤怒中举起了斧头。两人厮打了很长时间,最后弗洛伦斯逃离了铁匠家,临走前发现铁匠跌跌撞撞,流着鲜血。铁匠生死未卜。失去爱的弗洛伦斯,又再次陷入与母亲分离的痛苦中。小说中佛罗伦斯在最后叙述部分提到“我会永远记住一件悲伤的事情。那就是一直以来,我不知道母亲要对我说什么。她也不知道我想对她说什么”(158)。

由此,与情人通过暴力争斗给佛罗伦斯带来

的创伤,与她遭遇的种族主义仇恨造成的创伤,始至终都与跟母亲分离所造成的创伤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创伤性的循环。那么,佛罗伦斯作为人物的叙事中所展现的这种个体创伤的累积与循环又是如何参与到更大的群体创伤之中,并与之相互交织的呢?这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叙事是密切关联的。

三、其他人物的叙事中个体与群体创伤之相互交织

在小说最后一章,佛罗伦斯的母亲作为人物叙述者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从中我们才得知:母亲之所以选择让布瓦克将女儿作为主人的抵债品带走,是因为她发现开始进入发育期的女儿已经引起主人塞罗夫妇的注意了。她害怕女儿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两次被主人指派的人强奸,像牲畜一样为主人家繁殖劳动力,为主人提供新鲜的奶汁。相比佛罗伦斯的叙述,母亲的叙事部分似乎更为直接地揭露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造成的残酷现实。比如,母亲提到自己作为奴隶被贩卖的途中那生不如死的经历“我真希望周围的鲨鱼向我扑来,但是它们都不理我,仿佛知道我喜欢它们的牙齿更胜过环绕在我脖子、腰间和脚踝上的枷锁。想找出如何寻死的办法都很艰难”(164)。在母亲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她反复使用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她提到:

我们被藤条挨个捆绑着,被转移了四次。每次都有更多的交易、更多的筛选、更多的死亡。我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或者说我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直到最后我们成倍成倍地被关进家畜圈栏里。(165)

这里叙事人称的转换表明:母亲是在讲述她所从属的更大的奴隶群体的经历。母亲悲惨的经历是与整个奴隶群体中其他人的悲剧相关联的。很多人遭遇了与母亲同样的悲惨命运后死了,再也没有机会讲述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母亲,或许是出于保护女儿,不想让女儿过早的了解这些痛苦的经历,从未对女儿讲述过这一切。但她没有料到,她自身因种族主义和奴隶制所造成的悲惨经历又像一种可怕的病症遗传给了下一代,并引发了女儿后来的系列创伤,从而形成一种创伤

性循环。

与母亲这一部分叙事相呼应的是小说中另一叙事部分,即通过其他人物第三人称聚焦的叙事。比如,通过土著女仆莉娜的目光我们看到她们整个部落的消亡,“这些欧洲人既没有逃跑,也没有死光…还要更多的人到来。…他们随意带走妇女供他们及时行乐,他们破坏土壤…让神圣的地方充满污秽”(54)。而遇难船长的女儿索洛的聚焦,则为我们展现了整个大西洋沿岸的血泪史。这些叙事不仅仅是对弗洛伦斯叙事的补充,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与母亲的叙事一起构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集体创伤的叙事。从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的“伊甸园中的两种原罪:对当地土著几乎灭绝性的杀戮以及从非洲贩卖奴隶”(Gates 1)。

这些第三人称叙事穿插在佛罗伦斯的每一个讲述片段之后。这样,她的每一段叙事都被下一段叙事切断,而下一段的叙事有时候是对上一段讲述的补充,有时候相互矛盾^⑦,有时候又相互重叠。这些不同的讲述仿佛形成了一张复杂的网络,从中我们仿佛看到整个群体陷入了一张个人与群体相互交织的创伤之网。其中大多数人就像母亲的叙述中所提及的那样,悲惨地死亡,她们的痛苦创伤从不为人所知。而活着的人,也如同佛罗伦斯和她的母亲一样,无法通过有效的讲述交流来走出创伤。

四、不完整的叙述交流:无法通过讲述走出的文化创伤

关于叙述交流与创伤恢复之间的关系,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肖(Jonathan Shay)曾做过如下界定“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亦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位/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然后,这一/些听众又能够真实地将这一事件向他人再次讲述”(Shay 4)。这表明在创伤叙事交流过程中受述者或者听众的重要性。在修辞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看来,叙事不仅仅是对事件的表现,它本身也是一个事件,即某人在某个场合处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述一个故事(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14)。

从莫里森的创作来看,她的很多作品也表明:

向他人叙述受到抑制的创伤,尽管这一过程本身很痛苦,但它却是从创伤中恢复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在其前期作品《天堂》中,遭受创伤的妇女是通过相互讲述他们痛苦的经历而开始她们的恢复(Brant - Berg 81)。从这一意义上讲,她们的叙述交流是完整的。但是在《慈悲》中,我们发现作为弗洛伦斯母女二人的叙事却因受述者的缺失而成为不完整的叙述交流。

小说一开始就是佛罗伦斯对受述者——她曾深爱的铁匠讲述自己的经历。“别害怕!我的故事不会伤害到你,尽管我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一切”(1)。但是,在她的叙事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的是这样的讲述“如果你活着,或者说如果你的伤恢复了,那么你就得弯着腰读我所讲述的这一切,或许在有的地方你还只能趴在地上读”(158)。显然,从一开始,弗洛伦斯就不知道铁匠在她抡起的斧头下是否得以幸存。失去爱的弗洛伦斯,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她像一个困惑、愤怒的幽灵,每天晚上点着蜡烛在主人修建的大房子里将自己的故事刻在墙上。但是,这并未给她带来任何轻松感。她也表达了这种无法获得情感上的释放之困惑“最开始,我坚信讲述可以让我产生我从不曾有的眼泪。我错了。眼泪干了。我只有当灯熄灭了以后才会停止讲述”(158)。在完成讲述后,她又意识到铁匠不会识字,不会读她的故事。对佛罗伦斯来说,除了铁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听众。“我只能对你讲述,我无法对任何其他的人讲述”(159)。

在佛罗伦斯的叙事结尾部分,她这样提到“或许这些文字需要外面世界中的空气。需要高高的腾飞然后落下,如同灰烬落在那成片的报春花和锦葵之上…妮娜会帮我的。她也发现这个房子的恐怖,我知道她更喜欢火”(161)。这似乎给出了一种暗示,即弗洛伦斯准备烧毁主人的房子。由此,她在即将毁灭的房子里记录下来的故事,也永远不会有听众。这样,受述者的缺失,也使得她的叙述就像众多奴隶的声音一样,永远消逝而不为其他的人听到。

与佛罗伦斯讲述部分相类似,母亲的讲述也是不完整的叙述交流。尽管母亲是以对女儿的口吻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实际上女儿自离开母亲后就从未有机会听到这一切。也正因为如此,女儿至始至终都无法真正理解母亲,并且以为母亲之所以选择让她离开,是因为母亲不爱她。这从弗

洛伦斯叙述部分的结尾句可以看出,“妈妈,你现在会感到欣慰了,因为我的脚掌和柏树一样坚硬”(161)。从整部小说中仅有的这句女儿对母亲的直言说,可以看出女儿一直误以为母亲不让她穿合脚的鞋,真的是希望她的脚掌变得坚硬。而事实上,从后面母亲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她没有让女儿穿合脚的鞋子,是因为她不想让开始发育的女儿引起主人的注意,从而遭受比赤脚更为痛苦的事情:主人的性虐待(166)。但是,母亲出于保护女儿的这一慈悲行为^⑧却被女儿误认为是遭母亲的遗弃。

紧接着佛罗伦斯叙述部分结尾句的,则是下一章里母亲出于无奈的悲叹,“理解我吧。我没有任何办法保护(你)。教理手册上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对他们说‘不’”(162)。从文本中母女叙事的位置来看,将这对从未有机会相互交流的母女二人各自的悲叹前后相连,这不仅仅为文本提供了一种紧凑、完整的框架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似乎也表达了隐含作者的某种愿望:母女叙事首位相连,既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分离的反抗,也可以看作是对造成这一分离背后的种族主义暴行的控诉:这对母女之间本应该有着无法割裂的根本的纽带,但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却将本应该在一起的人们分离开来。由种族主义创伤导致的各种心理痛苦,由于缺乏有效的交流而从未被充分听到,也由此给他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性循环。

本文的上述分析表明,在小说人物叙述者佛罗伦斯的叙述中,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创伤给个体造成的伤害是一种累积性的创伤的循环,它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心理学意义上单个创伤化事件给个体造成的影响;小说中母女二人的叙事首尾相连、人物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的交替使用,这使得不同的讲述仿佛形成了一张复杂的网络,在揭露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残酷现实的同时,也进一步暗示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暴行下个人与群体所陷入的相互交织的、难以逃脱的创伤之网。它困扰着非裔美国人这个群体的成员,对其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小说中人物叙述交流的完整性来看,母女叙事部分中受述者的缺失表明:由种族主义创伤所造成的各种心理痛苦,由于无法准确、充分地记录下来,因而也从未被充分听到。尽管弗洛伦斯力图表达这一切,但没有人能够听到。

虽然她可以书写,但是她记录在房子墙壁上的故事和文字将会因为房子的烧毁而永远不为人知。在谈及莫里森的创作时,约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曾提到,莫里森的小说创作是一种高尚而且必须的工程,它揭露奴隶制的罪恶以及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所经历的磨难(112)。在《慈悲》中,莫里森向读者揭露的不仅仅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未被记录的创伤。它记录了受害者尚未被言说、或者未被充分言说的关于痛苦和抗争的内在表达。与此同时,它也承认还有众多的声音未被记录、不为人所知。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创伤理论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那些因种族暴力、大屠杀等民族罪行所产生之后果的话,那么,将叙事模式的运用与文化创伤的呈现相关联,揭示《慈悲》的创作者是如何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因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创伤之复杂性,这又进一步证明文学作品创作本身也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关于创伤本身的研究。

注解【Notes】

- ① 聚焦于个体创伤化经历的创伤研究源自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模式。该理论对当代创伤研究领域的专家比如朱蒂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1992)以及卡鲁斯主持编写的《创伤:记忆的探索》(1995)都被视为这方面研究的里程碑。
- ② 埃里克森指出集体创伤是“对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结构的一种撞击,它破坏了联系人们的纽带,而且还损害了人们已有的群体感。”(Erikson 233)
- ③ 论文中凡引用外文作品,均由笔者自译。
- ④ 根据修辞叙事批评中人物叙事模式的界定,即“是指叙述者同时也充当作品中的人物的叙述。”对于“人物叙述”这一术语所涵盖的范围,费伦进行了十分细致的阐述,他指出,这一个术语既包括那些集主人公、叙述者于一体的叙事,也包括叙述者运用第二人称对其自身讲述的叙事。此外,还有“序列叙述”、“观察者叙述”和“面具叙述”。(Phelan 197)
- ⑤ 这里有与她相伴的妮娜,一位美国本土长大的土著女仆,她将自己的爱倾注在弗洛伦斯的身上;索洛,一位在妮娜看来有点疯疯癫癫的女性,曾是遇难船只的幸存者;

丽贝卡,她们的女主人,她从欧洲远嫁不曾谋面的丈夫雅克布,还有主人农场上两位白人雇佣工。

⑥ Morrison, Toni. *A Mercy* (Toronto: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8) 凡下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只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⑦ 比如弗洛伦斯提到大家对索洛的看法,与后来通过索洛的第三人称聚焦的叙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⑧ 小说中提到,母亲认为布瓦克看上去比她的主人更为友善,心想让布瓦克带走女儿,这或许会让女儿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lexander, J. C.,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Brant-Berg, Kristy A. “No Longer Haunted Cultural Trauma and Traumatic Realism in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 and Toni Morrison”. *Ph. 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Oregon: University of Oregon Press, 2009.
- Durrant, Sam.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Ericson, Kai. *A New Species of Trouble: Explorations in Disaster, Trauma, and Commun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4.
- Gates, David. *Original Sins*.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008.
- Gilroy, Paul. *Small Acts: Thoughts on the Politics of Black Cultures*. London: Serpent's Tail, 1993.
- Phelan, James.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hay, Jonathan. *Achilles in Vietnam: Combat Trauma and the Undoing of Charact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4.
- Taylor - Guthrie, Danill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1994.
- Updike, John. “Dreamy Wilderness: Unmastered Women in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er*, 2008.

责任编辑:代云芳